

浅谈汉代合浦设关

王伟昭

一、设置合浦关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优势

1. 设置合浦关的历史背景

关于“关市”，《孟子集注》云：“关，谓道路之关。市，谓都邑之市。”《逸周书》曰：“关市平，商贾归之。”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载：“昔者文王之治岐也……关市讥而不征。”可见，早在西周时期，我国中原境内就已开始设关，而且往往与都市在一起。

秦代，关的设置遍及全国，如“秦地西有陇关，东有函谷关、临晋关，南有峽关、武关”^[1]。此外，“岭南也设有横蒲关、阳山关、湟谿关、涯口关和严关”^[2]等。西汉关的设置沿于秦，至武帝时由于疆域的拓展，在北方，一方面将已成内地的原六国边关废除，另一方面“分武威、酒泉地置张掖、敦煌郡”，增设玉门关、阳关（均位于甘肃敦煌西），扼守通往西域陆上丝绸之路之要隘^[3]；在岭南，元鼎五年（前112年）平定南越国，六年（前111年）设置岭南九郡，同时设置了郁林郡的雍鸡关，苍梧郡的离水关、荔平关，合浦郡的合浦关，还有九真郡的界关^[4]。其中，设于南海之滨的合浦郡的合浦关尤显重要，是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始发港——合浦港的所在地。

2. 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便捷的水陆通道

秦始皇为发动统一岭南的战争，开通进军和运粮之道，于秦始皇三十三年（前214年）“命御史监史禄自零陵凿渠，出零陵下漓水是也”^[5]，即开凿了广西兴安的灵渠，将湘江与漓江之水连接，沟通珠江、长江两大水系，形成中原抵达岭南腹地的水路交通网。同时，征发以曾经逃亡的罪犯、典押给别人的奴隶、商贩为主的五十万大军，攻取岭南之地，设置了桂林、象郡、南海三郡^[6]，合浦地属象郡。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岭南地区的统治，据南朝梁顾野王《舆地志》载，秦始皇三十四年（前213年）谪发“治狱不直者”（指不秉公办理讼狱的人），继续修筑通岭南的“新道”。在古代长途交通“非水不至”的历史条件下，秦始皇时开通了以灵渠为枢纽，联通长江、珠江两大水系的岭南水陆“新道”，给位于南海之

滨、南流江畔的合浦后来成为汉王朝与海外交通的始发港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。

秦汉时期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制约，汉朝使者和商贾的船舶与南海诸国的交往，基本是沿着海岸航行，而位于徐闻港外的琼州海峡东入口，不但风大浪高，海流湍急，而且鲸鲨巨鱼，时常出没为害。至唐代刘恂《岭表录异》仍云：“交趾回人，多舍舟，取雷州缘岸而归，不惮苦辛，盖避海歟之难也。”该海峡是高危航海区。所以，不论从汉朝内陆往南海，或是南海诸国往汉朝国都朝贡，航船经琼州海峡都是极其危险和不便的，而泊入位于南海北部湾畔南流江入海口的合浦港，正可避开琼州海峡的风险，解决这一难题。

从合浦南流江口，乘船溯江北上，至北流市境，徒步越过桂门关^[7]这段长约10公里的陆路，再登舟筏顺北流江而下，进入珠江水系，经梧州，溯桂江，过灵渠，接湘江，经湘桂走廊进入长江水系，再入洞庭湖，以至汉江上游的汉中，离京都长安就不远了，形成一条与中原联系便捷的水陆联运通道^[8]。汉朝的使节与贾船若从合浦港起航，沿海岸南下，可远航南海，穿越马六甲海峡，乃至印度洋，与沿途诸国交往贸易。同样，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沿途国家的使节、客商，也可经此水路直达汉朝内陆和都城。关于这条通道的成因，最初主要是秦汉王朝为开疆拓土、统一国家的军事战略需要。

早在西汉元鼎五年（前112年）秋，汉武帝便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、楼船将军杨仆等五路大军自中原下湟水、涇水、漓水和牂牁江，“咸会番禺”，平定了南越国。《交州外域记》载：“路将军到合浦，越王令二使者贲牛百头，酒千钟，及二郡民户口簿，诣路将军。乃拜二使者为交趾、九真太守。”^[9]这说明当时西汉的平越大军，已开辟了湘江—灵渠—漓水—南流江而达合浦郡治的水陆通道。

东汉初更有明确记载。《后汉书·马援列传》谓，东汉建武十七年（41年）交趾郡女子征侧、征贰反，攻略岭外六十余城，光武帝刘秀拜马援为伏波将军，率军南征平定内乱。马援自中原督军水陆并进，水路楼船将军段志至合浦境病卒，马援并其船队与将兵，“遂沿海而进，随山刊（勘）道千余里”^[10]。其中一路船队顺南流江而下，到了今广西博白县境的“马门滩”。据清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版《博白县志·古迹》记载：“马门滩，在顿谷堡，离县治西七十里，滩多峭石，

水流湍急，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，凿石疏通以便行舟。唐节度使高骈复凿之。行舟益利，至今赖之，滩上两岸俱立伏波庙，凡舟上下咸恪祀之。”[14]博白县至今还存在与马援有关的“饮马江”“伏波渡”和“北滩大元帅刘公墓”等遗迹。唐中宗神龙元年（705年）京官沈佺期被谪徙欢州（治今越南荣市），其取道经大庾岭，然后乘船溯西江、北流江入广西。在徒步经过桂门关时赋《入鬼门关》诗一首，诗中有“昔传瘴江^[12]路，今到鬼门关。土地无人老，流移几客还”之句，可知其过关后换舟顺南流江而下到达交趾。明崇祯版《廉州府志·名宦志》记载，北宋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，苏轼遇赦奉诏，从海南儋州量移廉州（治今合浦县城），后又奉诏徙湖南永州，亦是从小浦乘船筏走南流江越桂门关，进入珠江、长江水系的湘江而到达永州的内河水路。苏轼路经桂门关时曾赋诗云：“养奋应知天理数，鬼门出后即为人，天涯已惯逢人日，归路犹欣过鬼门。”^[13]其到北流域后，再乘筏北上赴永州。综上记载，可知汉代的马援自中原率军南征交趾，唐代的高骈赴安南平乱、沈佺期自长安流徙交趾，宋代的苏轼从海南岛徙永州安置，均走同一水路。可见，自汉至宋，南流江—桂门关—珠江水系—灵渠—长江水系而达中原和京城，这条水路是畅通的，也是连接南海航线至中原和国都长安最便捷的通道。所以，清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云：“北流县西十里有天门关（桂门关），颠岩邃谷，两峰相对，状如关门，中间阔三十步，马援讨林邑路由此，交趾往来皆道此关。”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亦云：“自汉武已来朝贡，必由交趾之道。”从上述记载可知，南海诸国使节和商人等若经海上丝绸之路到中国，他们就必然沿交趾海岸航行至合浦港，经合浦关进入南流江—中原这条当时最便捷、安全的水陆通道以达长安或内陆。当然，亦不排除有部分船舶在合浦港或徐闻港停泊休整后，冒险穿越琼州海峡，走零陵、桂阳峽道经秦朝修筑的驰道至中原的可能。

二、合浦关市的功能

汉代合浦关及关市的制度和职能，目前在地方史志、文献中，笔者尚未发现有明确记载，但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和其他一些史志，以及现代学者、专家的研究文献中，仍有许多关于秦汉时期设关的资料可做参考，虽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差异，但同期设置的合浦关在职能、制度、机构和管理等方面与之应该大同小异。

试析于下。

1. 关的管理机构

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曰：“关都尉，秦官。农都尉、属国都尉，皆武帝初置。”可知西汉“关”的主官为“关都尉”。关都尉、农都尉、属国都尉均同一品级，但无明确品秩，亦无职能的明确说明。但其品秩根据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的排位可作推断：“郡都尉，秩比二千石。”关都尉排位在其后，而在县令、长之前。县官“万户以上为令，秩千石至六百石”，可见其地位应比郡都尉略低，但又比县令高，其品秩应在一千石至两千石之间。

汉代的关是否都设关都尉？“汉承秦制，凡关皆设关都尉，或由地方官代管”^[14]，并且配备一定的辅助官吏、士卒。据《史记·老子列传》记载，老子“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关，关令尹喜曰：‘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。’”又《周礼·司徒·司关》曰：“司关，掌国货之节，以联关门。”《汉书·武帝纪》也记载弘农郡的武关，也设有关吏、士卒把守。陈梦家先生研究了出土的汉简，云：“‘玉门关候’诸简出土于玉门都尉治所(T14)，应隶属于玉门都尉，是守关口的一候官，下属有候丞及关尹。在救援车师的战争时，关候有兵可调。”^[15]以上记载，说明汉代守护关卡的官吏除关都尉外，还有令尹、司关、关吏、关候、候丞和守关的军队等。

合浦关设于汉王朝的南疆海滨，处在内联外接的港口和郡县治的都市，是国内外使节、客商云集之地，位置很重要，是汉朝与南海诸国交往的唯一滨海之关，接洽海内外出入境使节宾客是较为频繁的。据以上史籍记载推测，汉代的合浦关应该设有关都尉，并配备相应的关吏、令尹、司关或关候和守关军队等。

2. 关的职责

《周礼·地官司徒·序官》“司关”注：“关，界上之门。”又《吕氏春秋·仲夏》云：“门闾无闭，关市不索。”高诱注曰：“关，要塞也；市，人聚也；无索，不征税。”可见先秦乃至春秋战国时期，关的功能主要为军事防范，而在经济交流管理方面并不突出。据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：“汉兴，海内为一，开关梁，驰山泽之禁，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，交易之物莫不通，得其所欲。”可知西汉

初期，关市开放，商贾的商贸活动宽松，并不以关税为重；但西汉中期以后，则对关税有所偏重了。如《汉书·武帝纪第六》记载：“徙弘农（即‘弘农郡’，位于古函谷关，治今河南省灵宝市一带——笔者注）都尉治武关，税出入者以给关吏、卒食。”《汉书·酷吏传第六十》载，武帝时，宁成任关都尉，“关吏税肆郡国出入关者，号曰：‘宁见乳虎，无直宁成之怒。’其暴如此”。说明有些守关官吏，征收过往客商关税不但很重，而且非常苛刻，比母老虎还凶狠。李均明先生著《汉简所反映的关津制度》云：“汉代关津皆有一定的建筑形式，设有管理机构及驻防人员。关津在军事防御、控制人员往来、检查违禁物品、缉拿罪犯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。”^[16]又据《汉书·西域传》云：“自武帝始通罽宾……乌头劳死，子代立，遣使奉献。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。”可知守关官吏还负有迎送外国使节的职责。根据以上记载和专家的研究，可推断西汉时期的合浦关与北方的边关同样，“不仅仅作为军事性的防范机构存在，它在经济交流和政治地位也相当突出”^[17]。可知位处汉朝南部海疆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合浦关，在关市商贸的课税管理以及检查禁物、迎送本朝与海外使节等方面，也应负主要职责。

(1) 禁铁制器物出关。

《汉书·汲黯传》应邵注引汉律云：“胡市，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。”《史记·南越列传》载：“高后时，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。”《资治通鉴》载，高后出令曰：“毋与蛮夷越金、铁、田器、马、牛、羊。即予，予牡，毋予牝。”可见对岭南骆越民族的关禁甚严。汉时为保持汉朝军事、经济的优势，制约北方胡人、匈奴和南方的骆越民族，令其接受汉朝的统治，对其率先发明冶制的先进的铁兵器、农具进行严格的管理。西汉时中原地区的铁制兵器农具已相当普及，“西汉中期后，发明了利用生铁‘炒钢法’，此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到西汉后期，铁兵器和铁器皿已基本代替了铜兵器和铜器皿”^[18]。当时汉朝制作的铁器已很是精良，但北方的匈奴和南方骆越民族相对落后，与中原汉朝是不能相比的。

在汉朝与西域匈奴的战争中，《汉书·陈汤传》载陈汤语：“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，何者？兵刃朴钝，弓弩不利。今闻颇得汉巧，然三而当一。”又《汉书·奉

世传》中奉世亦云：“今反虏无虑三万人，法当信用六万人，然羌戎弓矛之兵耳，器不犀利，可用四万人，一定以决。”说明在武帝进击匈奴、拓展西域的战争中，制作精良的钢铁兵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《后汉书·乌桓鲜卑列传》记载灵帝熹平年间蔡邕奏曰：“自匈奴遁后，鲜卑强盛，据其故地，称兵十万，才力劲健，意智益生。加以关塞不严，禁网多漏，精金良铁，皆为贼有。”上述记载，说明西汉至东汉末，仍禁止铁器出关，但东汉末已较松懈。汉代的合浦关虽不是陆上疆界的边关，但作为与海上诸“外夷”交往的海疆边关，严防铁器外流也应是其主要职责之一。

(2) 珠禁制度。

西汉刘向著《列女传》之《珠崖二义》记载：“二义者，珠崖令（珠崖县县令。珠崖郡武帝元鼎六年置，位于海南岛，元帝初元三年罢，后汉为珠崖县，属合浦郡辖地——笔者注）之后妻，及前妻之女也。女名初，年十三。珠崖多珠，继母连大珠以为系臂。及令死，当送丧。法，内珠入于关者死。继母弃其系臂珠。其子男九岁，好而取之，置于母镜奁中，皆莫之知。遂奉丧归，至海关，关候士吏搜索，得珠十枚于继母镜奁中，吏曰：‘嘻！此值法无可奈何，谁当坐者？’”于是发生了“继母与假女推让争死，哀感傍人”的故事。上述记载反映了关于合浦出产珍珠的几个历史问题：

①关于“珠崖多珠”。关于西汉珠崖郡的地望问题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卷二十八下载：“自合浦徐闻南入海，得大州，东西南北方千里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、珠崖郡。”说明珠崖郡设在海南岛之上。元帝初元三年（前46年）撤裁^[19]。东汉建武十九年（43年）将珠崖郡原辖地复立珠崖县^[20]，为合浦郡管辖。合浦郡沿海是著名的海水珍珠产地，海南岛西侧与合浦产珠之“乌坭、平江池”相接，所谓“珠崖多珠”，应是泛指珠崖、合浦郡沿海一带出产的珍珠。

②关于“法，内珠入于关者死”。说明西汉时期对海产珍珠已设立法律严加管理，凡私自携带珍珠过关者均处死刑。又“至海关，关候士吏搜索”，说明珠崖县孤悬海上，其县令（多由朝廷委派汉人担任）死后归葬大陆故里，必然要乘船渡海沿合浦的海岸航行，而合浦关是西汉在南海沿海设立的唯一临海的关口。

所以，其文所谓“至海关”应是合浦关，同时说明该关驻有关候、关吏和军士把守。

③反映了汉代携带珍珠，凭“符传”出入关口的制度。《汉书·文帝纪》注引张晏曰：“传，信也，若今过所也。”如淳曰：“两行书缿帛，分持其一；出入关，合之乃得过，谓之传也。”师古曰：“古者用之槩，或用缿帛。槩者，刻木为合符也。”出入边关的行人、商货须凭合法符传方可放行。已故珠崖令之妻女，因幼子误将大珍珠藏于镜奁内，过关时被查出，险被处以极刑。据此推断，她们应是没持有准许携珠过关的符传。说明汉代在合浦“海关”已有严格的“过关用传”制度，禁止民间擅自采捞、私散可作贡品的好珠。

④关于严禁“内珠”入关的由来。两汉时期，由于封建帝王对奇珍异宝的需求，珍珠（包括玳瑁、翠鸟羽毛等）已大量用于宫廷装饰和礼仪服饰。《汉书》载，文帝“躬服节俭”，“于是后宫贱玳瑁而疏珠玕（珍珠之别称——笔者注）”。由此反推可知，在文帝之前的帝王、后宫均喜好珠玕、玳瑁等奇珍异宝。文帝之后各朝帝后又开始重视这些珍宝了。武帝时大兴土木，崇尚奢华，“木土衣绮绣，狗马被绩罽；宫人簪玳瑁，垂珠玕”^[21]；成帝宠爱赵飞燕之妹，为其居住的未央宫昭阳殿悉以“明珠、翠羽饰之”^[22]；宣帝时重臣霍光病逝，赐“璧珠玕玉衣”；东汉时太皇太后、皇太后入庙服“上为凤皇爵，以翡翠为毛羽，下有白珠”，皇后谒庙服“贯白珠为桂枝相缪”“诸爵兽皆以翡翠为毛羽，金题，白珠瑯绕，以翡翠为华云”^[23]。因古有传说，人死后口含珍珠可保尸身不朽^[24]。于是，帝王大丧“饭晗珠玉如礼”。《后汉书》引汉旧仪曰：“帝崩，晗以珠。”《后汉书》引《礼稽命征》曰：“天子饭以珠，晗以玉。诸侯饭以珠，晗以璧。卿大夫、士饭以珠，晗以贝。”根据以上记载可知珍珠已被大量使用于宫廷建筑、后宫命妇的冠服装饰以及帝王本人或赐给贵族、士大夫作丧葬礼仪，成了帝王“内廷”珍贵的御用之物，所以称为“内珠”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粤地“处近海，多犀、象、玳瑁、珠玕……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”。“粤地处近海”即泛指濒临南海的合浦郡一带。《后汉书》记载合浦盛产珍珠，是“合浦珠还”典故的发生地。明代《廉州府志》明确记载，

唐宋以前合浦就多有珍珠、玳瑁、翡翠（翠鸟羽毛）等奇珍出产，并进贡京城。明宋应星《天工开物·珠玉第十八》谓：“凡中国珠必产雷、廉。”《汉书·西南夷两粤朝鲜传》载，高皇后时，南越王赵佗遣“使者献白璧一双，翠鸟千，犀角十，紫贝五百，生翠……”《三国志·士燮传》记载，东汉末年士燮任交趾太守，其弟士壹任合浦郡太守，三国时归附吴国，士燮以明珠、大贝、翡翠、玳瑁、琉璃等贡献给孙权，“无岁不至”。据以上记载可知，从两汉、三国乃至唐宋，交趾、合浦郡的地方官，均向宫廷进贡珍珠和琉璃等珍异之物，可以推断，两汉时期宫廷御用的珍珠、玳瑁、翡翠等，尤其是珍珠，主要源于合浦郡。康熙版《廉州府志·沿革·纪年志》更是明确记载，“东汉末时，吴改合浦郡为珠官郡”，开珍珠与地名关联之先河，很可能设有主管珍珠采集和进贡的“珠官”（如《汉书·地理志》卷二十八下记载，南海郡的番禺县设“盐官”，苍梧郡的高要县（今高要市）也设“盐官”管理盐务。类推三国初吴国将合浦郡改称“珠官郡”，也应设有“珠官”，以主管采珠和贡珠之务）。《晋书》载，苍梧太守陶璜上疏云：“合浦郡土地硗确，无有田农，百姓惟以采珠为业，商贾去来，以珠贸米。而吴时珠禁甚严，虑百姓私散好珠，禁绝来去，人以饥困。又所调猥多，限每不充。今请上珠（上贡宫廷之珠——笔者注）三分输二，次者输一，粗者蠲除。自十月讫二月，非采上珠之时，听商旅往来如旧。”可见自汉至三国，为保证进贡宫廷的为优质珍珠，防止民间获得可作贡品的“好珠”，有时会禁绝“商贾来去”，在合浦关实行严厉的珠禁制度。

(3) 对外交通贸易。

西汉，自武帝派遣“黄门”译使与应募商贾组成使团，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之后，沿线各国经海路至汉朝交往、贡献珍异很是频繁。“自武帝以来皆献见”，至东汉时期更为频繁。笔者依据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统计，自西汉后期至东汉后期，来自古罗马、伊朗、伊拉克、印度、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缅甸、柬埔寨等国的使节和商人经海路沿交趾海岸到中国，有十多次。这还只是官方正史记载的重要外事活动，可以想见民间的商贸应更频繁。史书记载虽未注明在哪个海港或关口入汉境，但合浦港是其时唯一濒海而设

的关口。也是主要利用内河水道直通中原的最便利的海港，在当时岭南山高林密，瘴气弥漫，常有野兽强盗出没，走水路比陆路更安全的现实背景下，应有相当部分航船是在合浦港停泊，办理“符传”通关后，取道南流江—湘桂走廊水路而达中原内地。

汉代的合浦不但成为海内外交通的枢纽，而且其关市可能已形成珠宝、异物交易的国际市场。上文已介绍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，为配合地方经济建设，文物考古部门发掘清理了 1200 多座汉墓，出土随葬文物近 2 万件，其中众多的舶来品琉璃、琥珀、玛瑙、水晶、石榴子宝石串饰和金饰，以及胡人俑、波斯陶瓶等，是合浦港与中原内陆以及海外交通的重要物证。同时，这众多的舶来品也反映了合浦关市可能是汉代国际珠宝、异物交易和集散的都会。这一历史事实，在这些来自海外各国、品种丰富的舶来品中得到真实的反映。

①琉璃器。即玻璃制品。受科技水平的制约，玻璃制品在汉代仍被视为稀罕之物，到三国时交趾太守士燮还将琉璃器当作珍贵的贡品，献给吴帝孙权。中科院院士干福熹先生说：“广西合浦地区出土了大量的玻璃珠，大部分属两汉时代，数量远超过东南亚诸地。”^[25]玻璃器有佩饰类也有器皿类，其中以串珠居多。从墓葬发掘情况看，从寻常百姓到地方富豪、达官贵人都有琉璃珠随葬，有数十至数百乃至数千颗不等。经科学检测，以钾硅酸盐玻璃(K_2O-SiO_2)居多，“部分属中等钙铝和低铝的类型来自东南亚、印度等地”^[26]，也有部分是接受海路传入的玻璃制造技术后自产的，还有来自印度、东南亚的“混合碱玻璃”和“来自地中海地区的钠钙玻璃，俗称‘罗马玻璃’，^[27]”。

②奇石与异物。主要有石榴子石、琥珀、水晶、绿柱石、肉红石髓、玛瑙、蚀刻石髓、黄金等佩饰品。经检测研究，石榴子石珠饰：“它们应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和斯里兰卡一带传入的”^[28]。肉红石髓、玛瑙与蚀刻石髓珠：有人认为蚀刻石髓珠是从南亚或西亚输入，也有人认为，“合浦出土的蚀刻石髓珠，包括肉红石髓和玛瑙珠，来自南亚或东南亚的可能性更大”^[29]。水晶、绿柱石：“印度南部的德干高原是紫水晶的主要产地，也是宝石加工的中心”，“古印度佛陀时期，绿柱石就是一种流行的宝石，在 bnatipyolu 与毗普拉哈瓦扎雀王朝时

期的舍利塔中也有出土”^[30]。琥珀：“两广沿海出土的琥珀制品，以合浦最多、最为集中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约30座（汉）墓出土了琥珀珠饰。《后汉书》《岭外代答》记载，大秦（古罗马帝国）有琥珀出产，印度也有杂色琥珀。出生于公元23年（一说24年），卒于公元79年的普林尼著的《博物志》提到，大秦国向腓尼基人购买波罗的海沿岸产的琥珀，并以琥珀做原料制作工艺品，在当时价值非常昂贵，一尊琥珀雕制的小象比一名奴隶的价格还要高^[31]。所以，合浦的琥珀一般都出土于随葬品丰富的较大型的墓葬，其中还有众多的圆雕狮子、珠饰等，“而（琥珀）作为贸易商品，从产地汇集到罗马或印度，再通过海路辗转输入的可能性则相对较大”^[32]。

③明珠和香料。珍珠，亦称明珠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：“有译长，属黄门，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……”又云：“大珠至围二寸以下。”宋《岭外代答》记载，注犍国（今印度南部）、大食国（今阿拉伯）、三佛齐国（今马来半岛和巽他群岛一带）均有珍珠出产。西汉时虽然合浦已出产海水珍珠，但潜海采珠，风险极大，不但产量有限，而且珠禁甚严，因此取得“好珠”不易。而汉朝商人以“外夷”视为珍稀的中国丝绸、黄金，交换他们的明珠，会相对得到更多物美价廉的大珍珠，进口到国内既可作为高贵的贡品，又可贩卖，会获得更大的利润。香料。宋《岭外代答·外国门·香门》记载，三佛齐国盛产香药、沉香；真腊（今柬埔寨）产上等沉香，大食国产木香、苏合油、蔷薇水等香料；韩槐准《龙脑香料考》谓，汉时苏门答腊岛、马来半岛、婆罗洲以及波斯盛产的龙脑香，可能已辗转输入中国^[33]。合浦古代气候温暖，多雨潮湿，原始森林瘴气弥漫，瘟疫肆虐，人们认为焚烧香料之烟气，可驱邪消瘴，清新空气。所以发掘的合浦汉墓，较大型的墓葬一般都有一至两件铜质或陶质的熏炉，有些器内仍残存未焚尽的香料木炭，说明合浦民间当时很盛行使用香料，而这些香料应是经海路输入为主，但也不排除有些是岭南本地所产。

合浦关市进口的珠宝、异物、香料，除了部分为当地官吏、富豪和百姓以丝绸、土产交换或货币购得，部分留作商人自用外，大部分进贡宫廷或作为商品经销，成为合浦经济主要来源。如《汉书》记载京兆尹王章的妻儿谪徙合浦，经营

珠宝“致产数百万”。

根据上述史志的记载、考古的发现、对珍珠和香料来源的研究及其在合浦汉墓中遗存的普遍性，笔者得出结论：汉代的合浦郡治，不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归航港，而且其关市可能已成为“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”^[34]的珠宝、异物交易的国际市场。

三、汉代合浦关与中国近现代海关之异同及其历史演变

汉代的合浦关是由西汉中央王朝设立，任命专官，独立行使国家主权的第一个滨海之关，有学者称其为“中国第一个海关”^[35]。其位处汉朝南部海疆海上丝绸之路外联内接的海港、郡治首府都市，在检查禁物、关市的商贸管理和课税，以及“剖符通使”检验进出关口人员的证件等方面负有职责，与现代海关的职能相似。此外，它还负有迎送本朝与海外使节出入口岸的责任，尤其是合浦关虽然不在陆上边境，但位处海疆，在此驻军把守，将其作为防备“外夷”侵扰和本境“蛮夷”叛乱的军事要塞，这是现代海关并不具有的职责。汉代合浦关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，有着自己的特点，与西方和现代海关的职能有所差异，应为中国现代海关的雏形。

隋唐以后由于航海、造船技术的进步，航船已可绕行海南岛外洋，不必沿海岸远航，合浦港便显得不那么重要，海港的重点转向广州、泉州和明州等港口。唐宋时期东南沿海口岸不称“关”，而设“市舶”管理机构。唐玄宗开元间（713-741年）在广州首设市舶使，一般由宦官担任。宋开宝四年（971年）置市舶司于广州，后又于杭州、明州设司，以市舶司行与现代海关相似的职能，主要负责对进出口岸的外国货船、本国民船的征税，已没有汉代“关”的军事防御功能。据明崇祯版《廉州府志》载：“宋大中祥符三年诏许交趾互市廉州及如洪砦。”后晋刘昫《旧唐书》载：“重和元年初，广西帅曾布请即钦、廉州各创驿，令交人就驿博买。”北宋时期，在合浦以驿站管理与安南（今越南）的边贸活动。

外国海关机构的出现，最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古希腊城邦雅典。11世纪以后，西欧威尼斯共和国成立，以“海关”命名的机构即威尼斯海关。中国正式使用“海关”之名较晚，是清政府宣布解除海禁之后，于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四

年（1684-1685年），先后设置广州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四个海关。1842年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《南京条约》后，开放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，英国在五口有权驻领事等官员，并规定“英国商人‘应纳进出口货税餉费，均应秉公议定则例’”，致使中英贸易进出口货物的税率，比鸦片战争前降低了50%甚至90%^[36]。中国海关从此逐渐丧失关税的自主权，变成半殖民地性质的海关，长期被英、法、美、日等帝国主义列强控制把持，成为它们侵略中国领土和掠夺中国财富的重要工具。清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屈辱的《中英烟台条约》签订，其中允许开放廉州府合浦县的北海港为商埠，英、法、德、意、美、比利时和奥匈帝国等列强，先后在北海驻有领事官，并设立由英人把持的海关。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，中国政府接管了全国海关，独立自主行使国家主权，才宣告象征中国人民近代屈辱史的半殖民地海关历史的终结。

[1][2] 彭年. 汉代的关、关市和关禁制度[J].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, 1987(4).

[3][汉]班固. 汉书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7: 47.

[4][汉]班固. 汉书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7: 298.

[5][清]阮元. 广东通志·前事略[M].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1981: 2.

[6] 司马迁. 史记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7.

[7] 古关名，原称鬼门关，明宣德中改名天门关，故亦称天门关、鬼门关。在今广西北流市西，界于北流、玉林两市间，双峰对峙，中成关门。参见：党丁文. 广西历代名人名胜录[M]. 南宁: 广西民族出版社, 1991: 47.

[8] 罗香林. 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[Z]. 广东建设研究委员会, 1947.

[9][北魏]酈道元. 水经注: 第三册[M]. 北京: 线装书局, 2016.

[10][宋]范曄. 后汉书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7.

[11][清]任士谦. 博白县志[O]. 清道光十二年刻本.

[12] 瘴江即合浦南流江别称。参见清道光版《廉州府志·城池》之“越州故城”：“宋（南朝）置临漳郡，以界内漳江为名及越州理于此。”越州故城遗址在合浦县城东约40公里之南流江畔，可知瘴江即南流江。

[13] 党丁文. 广西历代名人名胜录[M]. 南宁: 广西民族出版社, 1991: 47、54.

[14] 彭年. 汉代的关、关市和关禁制度[J]. 四川师大学报, 1987(4).

[15] 陈梦家. 汉简缀述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0: 195-203.

[16] 李均明. 汉简所反映的关津制度[J]. 历史研究, 2002(3).

- [17] 翁重德. 西汉关及其文化形态[J]. 海交史研究, 2003(2):45.
- [18] 姚太中, 米运昌. 简明中国史:上[M]. 长春:吉林教育出版社, 1990:138.
- [19] [汉]班固. 汉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2007.
- [20] [明]张国经. 廉州府志[O]. 明崇祯十年刻本.
- [21] [汉]班固. 汉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2007.
- [22] 何清谷. 三辅黄图校释. 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2005.
- [23] [宋]范曄. 后汉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2007.
- [24] [明]宋应星. 天工开物[M]. 广州:广东人民出版社, 1976.
- [25] 千福熹. 关于中国古玻璃研究的几点看法[M]. 中国南方古玻璃研究:2002年南宁中国南方古玻璃研讨会论文集. 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3.
- [26] 熊昭明. 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[M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 2015:59.
- [27] 熊昭明. 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[M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 2015:61.
- [28] 熊昭明. 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[M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 2015:63.
- [29] [30] 熊昭明. 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[M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 2015:71.
- [31] 张星娘.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:第一册[M]. 朱杰勤, 校订, 北京:中华书局, 1977.
- [32] 熊昭明. 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[M]. 北京:文物出版社, 2015:101.
- [33] 韩槐准. 龙脑香料考[J]. 南洋学报, 1941, 2(1):3-19.
- [34] [汉]班固. 汉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2007.
- [35] 王杰. 汉代交州合浦港口的兴起与对外贸易[J]. 大连海运学院学报, 1991:(2).
- [36] 姚太中, 米运昌. 简明中国史:下[J]. 长春:吉林教育出版社, 1990:16.

(作者为合浦县博物馆原馆长, 文博副研究馆员)